

# 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析

刘永涛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它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加以运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文化战略是一种为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艺术。那么,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有何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又是如何确立和实施它的文化战略,使其为美国对外政策目标服务的呢?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 一、文化与国际关系

文化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等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文化的概念真正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则是近些年的事情。文化是一种社会建构,呈各种复杂的形态,可大体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定义,但是,至今尚未对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作出令人满意和一致的解释。一般地说,从理想、信念、愿望和其它表现人类思想意识的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际关系,就是一种文化的取向。它既不同于人们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时所采取的权力取向,也不同于研究全球市场和商品生产及交换时所使用的经济取向。

在国际关系方面,文化大体具备五方面的功能。一是文化为人们观察和认识国际关系提供一种感知和认知上的视角。人们在看待世界政治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

制于他(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条件。美国国务卿“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伊朗国王看待世界的眼光”,其差异“部分地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来自于他们各自扎根于几千年来不同的文明世界里”。二是文化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提供一种原动力。譬如,各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体系背景下对外界作出的行为反应并非总是一致的,行为体各自的历史及文化经历、它们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等会对行为体的行为构成推动力和影响。三是文化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提供了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如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存在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现象。国家及个人在对这些现象进行评判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不单是物质实力的问题,而是广泛地涉及到道德伦理的评判,譬如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问题。四是文化能帮助提供一种认同(或身份)基础。在世界政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国家之间相互区别,形成一种“自我”(本国)同“其它者”(其它国家)的关系。造成这种认同(或身份)上的“与众不同”的基础,除了本国所处的地缘位置、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本国的历史经历、语言、宗教信仰、种族、价值等社

Ali A. Mazrui: *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1990, p. 7.

会文化因素。正是这种国家之间的不同认同(或身份)决定着各自国家利益并对它们各自的物质实力和资源赋予含义。五是文化是国际关系中一种交往方式。在复杂的国际交往过程中,语言是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工具,其次有音乐、艺术、工艺、体育等。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认识,并且会把这类交流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一个辅助手段。

国家往往利用各种不同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如果说军事力量是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最后付诸的手段,那么,文化则往往是最先被国家所考虑使用的工具。一般而言,国家对外文化关系具有“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属性”。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国家之间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也往往“成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国家间文化交流和渗透的形式多样,可以通过国民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它活动的方式,可以通过国家开展双边文化交流项目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向海外输出本国文化产品的办法。一般地说,国家政府机构会从政策上对这类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和指导,甚至制订明确的对外文化战略,使这些文化交流和渗透活动最终为本国政治、经济、安全及其它内容服务。

## 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认同及利益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呈多样性,但是,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文化主要还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它的基础包括:个人主义、乐观主义、甘冒风险、有明确的个人身份感、自信、以赢者自居或追求赢者地位

等。这种文化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遵循的价值、认知、观念和理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美国意识形态占主导方面的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它源自17世纪的洛克自由主义和美国历史上的例外经历。洛克的自由主义哲学信念反映在美国独立宣言里。美国独立宣言吸收了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系列体现美国意识形态及价值的内容:合法的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认可;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倡有限制的政府、个人自由、自决权、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天赋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联邦主义等。这些都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例外论加强了这种古典的自由主义观念,认为美国从根本上讲有别于其它国家,而且在道德方面比其它国家更高尚。在美国人看来,美国不同于邪恶的欧洲和其它国家,而是一个值得其它国家效仿的国家。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即要把美国“民主的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对外关系中,美国主要谋求输出作为意识形态的两件东西,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前者体现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市场力量,后者体现为竞选政治及政治多元化。其它的输出还包括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对外决策者无不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和杰佛逊的“民主理想”,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美国人一直在追求使自己给“世界树立一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编译参考》,1991年第7期,第57页。

Jie Chen: *Ideology in U. S. Foreign Policy: Case Studies in U. S. Foreign Policy*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 6.

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谋求把这种自由和民主的“福祉”传播到世界各地。当今美国经济、军事及科技方面的明显优势继续支撑着这种“民主的资本主义”及美国例外论的神话,使它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确立自身范围”的政治行为,其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本国的地缘及政治认同范围;二是影响和颠覆“其它者”的认同,使其对美国的政治认同无法构成威胁。

美国的政治认同确定着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美国的认同或身份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体系模式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受制于美苏两极军事对抗、保持国家之间“势力均衡”的国际政治环境,而且是在有明确的潜在敌人和存在实际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确定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认同或身份发生变化,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上拥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任何核威胁,它“不再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军事安全”,也无“势力不平衡”之虞。美国想成为维护国际现状的“世界警察”,甚至是对现状变化的“仲裁者”。随着美国国家认同的变化,造成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欲望发生变化。在国家利益方面,它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确保不会出现一个其政治及社会价值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发生严重对立的超级大国;第二,保护那些分享美国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不受威胁。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认同及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形成和实施。

### 三、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

冷战后美国实施的对外文化战略在很

大程度上承袭了冷战时期的产物,主要包括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对外文化交流、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相结合等。

冷战后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对全世界千家万户和无数民众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199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尽管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对华广播是一个典型例子。目前,作为美国政府海外电台的“美国之音”,每周对华普通话广播84小时,藏语广播28小时,粤语广播14小时。它每周还有固定时间对中国播放电视节目。美国另一家电台“自由亚洲电台”。1996年3月11日正式开始运作,主要针对中国大陆、中国的西藏、缅甸、柬埔寨、老挝、北朝鲜以及越南的听众。目前,它每天24小时对华滚动广播,其中普通话广播12小时,藏语广播8小时,粤语广播3小时,另有1小时的维吾尔语广播。美国国会每年都给这些国际广播电台拨款,尤其积极扶植和资助新的海外电台如“自由亚洲电台”。2000和2001财政年度,美国国会给“自由亚洲电台”的拨款均为3000万美元。

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继续成为美国从事对外文化渗透的重要渠道。美国政府指导下的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如富布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2, p. 75.  
Irving Kristol: "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s Purpose: New Visions of U. S. Foreign Policy*,  
Owen Harries (ed.)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1, p. 68.

同上。  
参阅美国第106届国会众议院第4454号议案,  
即“扩大和增强美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范围活动的议  
案”。

赖特项目等就是例证,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在地区项目分配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也有所侧重。冷战后期,美国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项目增多。冷战结束后,美国加强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及文化交流项目,并配合其它手段如外援项目、投资项目等以巩固那里的民主自由化进程。据美国国会 2000 和 2001 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条例公布,美国政府在这两年里对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拨款分别达 1.12 亿美元,并专门拨款用于对越南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在 90 年代,美国政府还拨款资助西藏流亡分子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或“读书”,“学成”后送回印度和尼泊尔“开展工作”。此外,美国还开展“和平志愿者项目”等对外文化援助活动,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派遣到海外从事志愿工作;向海外赠送图书、杂志、画册、录像带或幻灯片等。这些活动既含有西方文明中的“慈善”成分,也带有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这类文化援助,美国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被传播到海外。

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另一种体现是把技术和贸易输出与文化输出相结合。美利用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商业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深化和巩固美国的文化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去“影响和引导”世界的未来方向。1989 年,美国国会开始谋求实施一项孤立中国的强硬政策,试图通过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时所采用的“遏制”手段对付中国。1990 - 1991 年间,国会通过一系列议案,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制裁,并试图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布什总统表示希望看到中国国内继续进行改革,并坚持认为只有与中国保持贸易接触才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

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1995 年 7 月 25 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魏德曼,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就中美关系作证时也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美国思想和理想借以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从长期来看,它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络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与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通过对华的经贸接触与往来,带动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大量输出,最终演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图谋。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国文化价值不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它的负面成分应该受到抵制。近年来,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等为了加强本国文化的纯洁性而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谋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本土文化正在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吞噬的威胁,日益焦虑地感到本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压力和冲击;政府也日益难以控制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所造成的社会涣散、道德蜕变以及传统美德丧失等局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文化领域已成为国家行为体之间为维护本国主权而开辟的一个新的较量场所,其激烈程度正在与日俱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Joseph S. Nye, Jr. and 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 - April, 1996, p. 3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9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567.

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 U. 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uly 25, 1995.